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余南平

内容提要: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欧洲经济主权 战略自主 战略安全 全球价值链重构

一 前言

国家主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国际法中公认的国家基本权利原则,它体现了国家对内事务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事务的独立权,其中包括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等。按照一般意义的理解,经济主权原则体现的是国家对属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文中关于欧盟全球价值链及各行业价值链的计算和结果由课题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夏菁提供,文中相关的欧洲项目投资信息由课题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张翌然、冯俊锋收集整理。

于本国的全部财富、自然资源以及经济活动等拥有的完全独立且永久的权力。^①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其情况则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内涵的界定,“向欧盟让渡主权”本身就是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为“经济主权”在现代意义上的界定增添了新内涵。^②

虽然有了突破与创新,但对于许多欧洲国家的内在变化而言,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和面对的,既不简单的是欧洲国家失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概念下的国家主权认知与行动自主,使得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在过去几十年间在欧盟国家成为一个“淡然概念”,^③也不单纯是欧洲国家基于自身社会和政治历史结构形成的独特而差异化的经济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性渗透的简单相逢与较量。真正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欧盟作为一个事实上的“超国家经济体”,不仅没有足够的工具,像主权国家通常通过垂直化、体系化的宏观政策对“经济主权”进行有效的维护,同时还不得不与全球其他各大国展开政治经济层面的全面竞争与博弈。

然而自2019年起,也就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欧盟范围内维护“经济主权”的战略安全诉求声音突然聚集和放大,而2020年疫情的暴发又促使欧洲加快了强化与落实“经济主权”的行动。究其原因与分析其相应的行动,到底源自美国特朗普执政颠覆全球化既有的多边主义路径进而导致欧洲开始强化和追求自我战略安全的保护性行为,还是来自当下全球经济格局中欧洲对于自身竞争力蜕化过程中的担忧,包括美国对中国加大博弈力度而引发的欧洲对自身经济基础的焦虑,抑或是欧洲真的意识到“百年变局”已经展开,进而到了必须通过“自我行动”塑造全球独立自主的一种战略力量的时候?种种解释似乎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必须明了的一点是,对于已经几乎忘却“经济主权”概念的欧洲而言,其重提“经济主权”的动因是什么,其战略行动方向和抓手是什么?这些行动对于已经嵌入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影响是什么?是否属于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某种结构性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值得探究和深思,而且是判断未来欧洲在全球角色的重要基础。

^① 主权问题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基础性政治哲学概念,同时也是法理学讨论的主题,是源于主权概念自身的结合能力,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深入研究。在最近有关欧洲主权的讨论中,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沃尔克认为:“主权概念创造了内在和外延,它包含了内在秩序的政治理念(安全、和平、等级制度)和外在秩序的政治理念(国家平等、禁止干涉等),它创设了关于法律本质的假设(如法律的命令说)、公共权力的基本结构,同时能够把这些思想联系起来”。其具体论述参见 Christian Volk,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in Globalized Times,”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 February 2019。

^② 徐泉:《国家经济主权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③ 2017年1月,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在《匈牙利评论》上以“匈牙利和欧洲危机”为题公开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于国家主权,特别是保卫“文化权利”的观点。在文章中,欧尔班特地使用了“我们中东欧人”这个刺眼的词汇,引发了布鲁塞尔的一片哗然,使得“新老欧洲”对于国家主权认知的差异公开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文章,参见 Viktor Orbán, “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 *Hungarian Review*, January 24, 2017。

二 欧洲加强经济主权的动因分析

从表面上看,重塑欧洲“经济主权”似乎是欧洲人在经历全球化浪潮后幡然醒悟、进而重拾历史记忆的一个选择。就历史记忆而言,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19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其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狭隘性的同时,强调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比价值本身更重要,国家的生产力强大是思考全球经济问题的基础。^① 李斯特的理论学说一方面得到了同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定程度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相应的批判。^② 他的“国家经济学”学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同时代德国、美国、俄国等与先进的英国进行国际竞争并加快实现自身工业化的经济行动指南。^③ 当然,欧洲并非只有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从经济思想的影响力和扩散性而言,英国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经济学说不仅发源于欧洲,同时在历史进程中,包括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渗透中更是影响了几代欧洲人。

当欧洲人近乎忘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后,从2017年开始,保卫“欧洲经济主权”的各种舆论明显增多。虽然,对此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充分关注,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④ 但笔者更关心的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如果要在特定历史阶段成为一种“共识”并能够影响政治决策,那么它的共振肯定不是来自单一的某种理论学说的再诠释,而是来自诸多力量的合力并可以产生实质性行动。而分析欧洲“经济主权”认识的回归,包括对应出现的欧洲“战略自主”“技术主权”和“数据主权”等子概念的应用,其内在动因和背景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 理论认识上对于全球化的再反思

^① 早在1927年,李斯特的传世之作在中国就以《国家经济学》为名翻译出版,而商务印书馆在1982年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中,再以《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发行出版。在书的自序中,李斯特还特别说明:“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在自序中可以看到作为经济学家的李斯特表达了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② 同时代的马克思对于德国同胞李斯特极为熟悉,当李斯特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职德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莱茵报》主编职位时,不久之后,马克思就接替了该职位。作为同样以“生产力”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在其诸多的文章里均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了肯定与批判并存的评价。

^③ 李斯特与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思想深受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提交美国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的观点影响,他本人也在美国长期居留和经商。最重要的是,李斯特作为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生产力”学说,被该学派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独特而秘而不宣的美国学派。而该学派的观点和影响一直贯穿和主导着19世纪的美国国策,并为美国的“世纪性崛起”提供了务实的经济指导思想。有关经济学美国学派的研究,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青年学者忻华已经对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提出及其战略内涵进行相当详尽的分析,参见忻华:《“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0页。

如果说意大利米歇尔·马索内教授在国家主权与全球化内在张力讨论(National Sovereignty Vs. Globalization)中提出的观点,开启了2017年全球化转折时出现的欧洲“经济主权”概念讨论的话,^①那么其思想深处还未摆脱既有全球化问题认识的基本框架。^②马索内强调,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色紧身衣”不仅是欧盟自身的约束,^③同时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如何保持和增加国家能力,以应对显性的全球化“失序问题”。其观点与新千年开启时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约翰·奎金对于全球化未来需要关切的认识并无明显的差异。

早在20年前,本轮全球化浮现曙光并迎来高光之时,^④奎金即已预见到,全球化一定会被当作国家主权的对立面来讨论。他用全景式的手法,从全球经济循环和金融角度,论述了19世纪晚期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下的全球经济失败,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阶段的全球政治结构失效和无序,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黄金时代”的短暂,批判了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在“混合经济”与新自由全球主义对立之间奢望超越的“混乱妥协”,^⑤并对以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为基础支撑向全球推广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表示质疑。奎金注意到了欧洲大陆的特殊性,在承认欧洲一体化影响扩大的同时,认为欧洲社会民主一定会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相遇与较量,国家主权也会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波动与起伏,这取决于欧洲大陆经济体与外生变量的美国、英国经济繁荣的相互比较。^⑥

理论认识的反思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欧洲中央银行执委会成员、法国经济学家伯努瓦·科尔(Benoît Cœuré)在《2018年欧洲舒曼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了

① 2017年全球化转折点的双标识是英国完成脱欧公投与特朗普执政后提出“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原则。

② 在米歇尔·马索内教授看来,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是关联紧密的讨论主体,全球化过程中的主权国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全球化对主权的削弱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其本身所需要的。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较量中,民族国家本身的作用并不明显,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回应民主选民的意愿,还是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金色紧身衣”的严格限制。具体论述参见 Michele Marsonet, “National Sovereignty Vs. Globalization,” *Academicu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 No.15, 2017, pp.47-57。

③ 欧盟的基础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身就是对“金色紧身衣”问题做出的回应,其对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规定本质上是隐含了对国际金融市场“金色紧身衣”约束的遵循。因此,国际金融市场“金色紧身衣”不仅是一种资本润滑剂,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其通过对融资成本、规模和以经济表现为支撑的“国际信用”进行放大或抑制民族国家的发展能力。

④ 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全球化迎来迅猛发展的标志性时刻。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欧共体完成向欧盟过渡;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生效,完成了高水平经济一体化运行框架;1996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确立了当今全球自由贸易多边体系;但这都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推动了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最关键的动力。事实上,恰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将自身生产力和潜在放大效能融入世界后,全球化才获得超越以往规模、领域、深度的迅猛发展,并迎来了全球化的“高光时刻”。

⑤ 20世纪9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描绘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不仅被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视为“治国方略”,同时其思想影响也扩散至欧洲大陆,并迎来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巅峰时刻。

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奎金教授的文章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John Quiggin, “How to Save the Euro—and the EU: Reading Keynes in Brussels,”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3, 2011, pp.96-103。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某些显性变化,并以“重获主权”(Regaining Sovereignty)为主题进行了专门论述。^①他认为,欧洲退回边境封锁、重新实施再国家化政策,不仅无法逃避全球竞争并与全球价值链隔离,而且剥夺了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就。面对欧洲如何“重获主权”的问题,科尔的解释是,欧盟的创设者们已经设计了一种集体管理开放市场的机制来应对挑战,它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以恢复全球化侵蚀的某些国家职能。因此,无须在开放和主权之间做出选择,只要在欧洲机构内部共享主权便可使各国“重新获得主权”。^②

依据科尔的观点,欧盟本身现有的架构与施展空间,已经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2011年提出的“全球化悖论”提供了“欧洲化”的解释答案。根据罗德里克的分析和研究,全球化的特质使得民族国家不可能在同时追求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取得“三角平衡”。^③因此,可以认为,就在2017-2018年,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引发的“全球化进程异动和逆反”中,欧洲人已经在理论上反思了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部分欧洲学者还是在理念上将传统的“国家经济主权”与一体化融合后的“欧洲主权”视为一体,并希望以欧盟的力量来解决全球化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引发的战略竞争考量

现实环境的变化总是使人们主动和被动地采取符合自我认知的应对,欧洲人也并不例外。进入2019年后,受美国对中国和欧洲主动挑起“贸易战”而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在欧洲公共舆论界,关于“欧洲主权”的讨论陡然剧增,并已从边缘话题开始向中心话题聚焦。

从应对现实的战略环境变化角度看,2019年4月,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总监芭芭拉·利珀特(Barbara Lippert)从全球竞争力角度审视了欧洲战略自主

^① Benoît Cœuré, “Taking Back Control of Globalisation: Sovereignty through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Central Bank, March 28, 2018.

^② “重获主权”来自2017年欧洲罗伯特·舒曼基金会研究主管蒂埃里·肖邦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主权欧洲”应该变成一项欧盟政治新议程。作为法国人,肖邦在文章中突出强调了法国可以捍卫欧洲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的同时,重新解释了“差异化欧洲”的含义,并认为应该承认国家利益的异质性,要在开放的前提下推进“差异化”发展,而法国和德国必须在欧洲关于主权问题的地缘政治的新战略中发挥推动作用。具体文章参见 Thierry Chopin, “Defending Europe to Defend Real Sovereignty,” *Notre Europe*, April 25, 2017.

^③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和国家产业政策问题,认为需要对欧洲全球市场地位进行持续性的防御。^①而更具影响力的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欧洲著名智库布鲁盖尔(Brugel)的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等人在2019年6月公开了一份名为《重新定义欧洲的经济主权》的政策建议报告,认为欧洲人都乐于相信欧盟具有决定其自身经济命运的集体经济规模和能力。但是,其他全球大国的行为正在使这种能力受到质疑,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没有像欧盟那样将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利益区分,反而越来越多地利用各种联系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并寻求使用经济工具来确保地缘政治优势,结果就是欧洲的经济主权受到威胁。对此,欧洲应该在不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或退出全球化的情况下,提高欧盟运用经济实力的能力。为此,欧盟委员会应制定一项经济主权战略,并建立一个经济主权委员会,纳入经济和安全的考量。^②

从全球竞争看待战略安全而言,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奥登达尔博士于2019年10月在德国著名的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强调,经济主权意味着可以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发挥经济实力以及稳定整个国内经济。从理论上讲,美元和欧元都可以是储备货币。^③进入2020年后,新冠疫情暴发并未降低全球主要经济体战略竞争的强度,反而引发了欧洲人对于战略安全的焦虑。2020年9月,利珀特再次撰文认为,欧洲可以自由决定其国际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而不受外界影响,欧盟必须扩大其手段范围,以抵消域外制裁的法律效力并增强欧洲经济的自我主张;^④德国外交政策专家、保护欧洲免受经济胁迫任务小组负责人乔纳森·哈肯布罗伊奇(Jonathan Hackenbroich)等人则在2020年10月撰文认为,欧洲人经常孤立地审视美国的制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制裁是源自几个国家的更广泛的经济威胁现象的一部分,从而侵犯了国家和欧洲的主权。最危险的胁迫不是来自欧洲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大多数经济胁迫将来自中国,可

① 芭芭拉·利珀特(Barbara Lippert)在题为《欧洲战略自主:角色、问题与利益冲突》(“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的文章中认为,全球竞争意味着需要对非欧洲竞争者的市场地位进行持续防御,这对企业家的主动权和产业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是前瞻性的规制体系,德国和欧洲将很难捍卫自己的竞争力。因此,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是实现欧洲战略自治的必要先决条件。具体文章参见 Barbara Lippert, Nicolai von Ondarza and Volker Perthes,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WP Research Paper*, No.4, 2019, p.39.

② Mark Leonard et al., “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 n°9, June 2019.

③ 在其具体的表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奥登达尔博士的主张有重回李斯特国民政治经济学的痕迹,参见 Christian Odendahl, “Europas ökonomische Souveränitä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ünchener Seminar”*, October 21, 2019.

④ Barbara Lippert, “Krisenlandschaften und die Ordnung der Welt,” *SWP Studie*, 2020, p.108.

能还有俄罗斯。^①

因此,就应对全球地缘政治新格局和欧洲战略安全而言,一方面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过去几年间,欧洲人对于“经济主权”“战略自我”的讨论已开始从理论宏观层面向具体的国家层面进行转移与聚焦;另一方面,像让·皮萨尼·费里这样的学者(曾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竞选项目总管和主要智囊,同时又任法国政府战略规划总监)也加入其中。那么可以推断的是,欧洲“经济主权”的讨论,事实上已不再停留于全球化的理论认识层面,而将落实到各类政治行动中去。

(三)新技术革命与技术竞争加速带来的战略恐惧

虽然,欧洲人的自信使他们从未公开承认过,自身既有的产业链面对全球新技术革命时准备不足,包括新技术产业链始终无法形成生态闭环,特别是数字经济转型无法突破困境。^②但很显然,相比20世纪90年代爱立信、诺基亚在移动通信行业的风光,在新一代5G通信领域,中国华为公司的技术与市场能力已使欧洲人认识到必须在国家“战略安全”与经济成本和技术领先上进行困难抉择;同样,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欧洲也无法应对来自美国的亚马逊、谷歌、脸书等超级公司的竞争,只能启动“数字税收”加以回应和博弈;而在先进半导体计算芯片(CPU、GPU、TPU)等领域,欧洲人不仅毫无建树,同时其自身拥有的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等传统强势半导体器件公司,还得面对美国科技巨头自身技术“异变”的威胁,包括欧洲本土通过数十年孵化并拥有创新技术生态能力的软件公司ARM(英国公司),最终还是被美国的英伟达公司高价收购。上述种种严酷的事实,使得欧洲人不得不认真审视自身在全球新技术革命的竞争中拥有的战略实力。

早在2019年3月也就是全球5G商业网络建设启动期,欧盟委员会给欧洲理事会提交的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已经公开表示:“外资在欧盟战略领域的投资,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收购,参与欧盟标准制定和关键设备的供应都可能对欧盟的安全构成风险,例如5G网络”。^③而欧盟委员会内部智库欧洲政治战略中心(EPSC)则在2019年7月发表了《反思数字时代的战略自主性》的报告,强调“工业和技术基础

^① Jonathan Hackenbroich et al., “Defend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New Ways to Resist Economic Coercion,” *European Council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020.

^② 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报告显示,虽然在全球创新指数国家(GII)排名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排序,欧洲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丹麦、芬兰和德国均在全球得分排名前十之内(德国为前十的第九),但以2020年GII经济指标排名最高的GII全球经济体来看(投入产出总得分),在十个全球经济体中欧洲只有卢森堡、丹麦和瑞士入围,分别位列第4、8、10名,最好的水平与中国相当,明显落后于美国,而中国是连续5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国家。具体参见Soumitra Dutta, Bruno Lanvin and Sacha Wunsch-Vincent,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0.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Join(2019) 5 final, 2019.

是关键,强大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对欧洲的战略自主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进口有助于弥补欧洲的一些不足,但过度依赖外国技术也会带来风险。欧盟成员国将越来越多地集中资源,它们需要就数字技术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推进达成共识”。^①

虽然政治家们对于技术本身的变化反应较为迟钝,但是技术的快速进步通过全球竞争带来的广泛政治经济影响,使他们不得不对技术“链式裂变效应”做出反应和应对。2019年9月,法国法兰西银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罗伊·德·加尔豪(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在巴黎国际事务学院以“欧洲的经济主权是什么”为题进行了演讲。他指出:“目前,对欧洲经济主权的挑战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与政治决策有关;第二类与技术力量的出现有关。这些技术力量的影响范围超出了单个国家的技术制造范围。”^②显然,其强调的“技术”本身已被纳入影响“经济主权”的战略视野。面对欧洲官员的公开呼吁和欧委会智库的战略报告,欧盟委员会不可能无视更不可能无所作为。2019年年底,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2020年欧盟国情咨文时明确提出:“现在复制超级规模企业可能为时已晚,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技术主权还不算太晚。为了引领下一代超级规模企业,我们将投资于区块链、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算法和工具,以实现数据共享和数据使用,我们将共同制定新一代技术的标准,这些标准将成为全球规范”。^③她的演讲等于承认了一个事实,即欧洲目前已经没有复制超级规模企业的机会了。而所谓的超级规模企业代表,就是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等全球性技术公司。这是欧洲政治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四)民粹主义运动的长期影响

民粹主义与“国家主权”,包括与“经济主权”的天然联系是符合其政治考量和政治动员的基础逻辑的,几乎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会忽视“国家主权”的主题并使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放大。虽然有理论研究更关心民粹主义本身的“反自由、反民主、反多元、垄断人民概念”的讨论。^④也有学者专门论述了2008年经济衰退对跨大

^① European Political Strategy Centre, “Rethinking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Digital Ag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 2019.

^② 该演讲内容折射出欧洲技术官僚的历史学、金融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视野和宏观问题的驾驭能力,具体参见 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 “What Economic Sovereignty for Europe? Facing the Threats with Lucidity, and Boldly Seizing an Opportuni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Paris”, September 18, 2019.

^③ 欧盟委员会主席的2020年度咨文报告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Von der Leyen Commission: One Year On,”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first_year_of_the_von_der_leyen_commission.pdf.

^④ 如欧洲思想史和政治理论杰出的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德国人扬-维尔纳·米勒以“人民”的宽泛视角全面论述了民粹主义本质与政治表现。具体参见[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西洋两岸民粹主义崛起的影响,包括当下欧洲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①但是,这些论述都没有详细展开讨论,民粹主义究竟能以什么形式推动“国家主权”与“经济主权”的认同。

从前后的关联性角度看,对于大部分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法国国民阵线(FN)的历史性崛起和起伏,还是德国选择党(AFD)在欧债危机后的兴起,大多关注的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与失业率上升对民粹主义浪潮产生助推作用,或者说在关联性上可以证明经济衰退与所有的民粹主义运动呈正相关关系。但如果深入探究民粹主义的底层政治逻辑,包括分析其所鼓动和所能动员的对象群体(沉默的大多数)的特征可以发现:虽然表面上是“全球化失败者”构成了民粹主义的中坚力量,但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社会精英,所有民粹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精英”并坚持诉求“国家主权”。^②所以,当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以“人民利益”为名进行底层社会政治鼓动时,从未放弃在“他类政治精英”群体中的力量凝聚。^③

正是由于民粹主义“他类政治精英”的特点,包括民粹主义政治逻辑本身共同塑造了认知需要,近年来,泛欧洲的各类民粹主义政党精英们,在面对民众的政治鼓动中从未忽视“国家经济主权”的概念推广。如2015年欧洲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接受采访中明确表示,欧盟的金融市场只在乎它们自身的利益,法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主权。^④2019年,法国民粹主义政党塑造的年轻右翼政治明星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在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中也无一例外地宣称:“要从欧盟委员会手中夺回主权”。^⑤时任意大利副总理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作为意大利极右翼同盟的领导人 and 欧洲冉冉升起的民粹主义明星,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同样表达了“意大利优先”的国家主权至上

^① 著名政治分析家约翰·朱迪斯全面总结了美国与西欧民粹主义的异同,并分析了民粹主义在欧洲发展的历史,包括其21世纪的新特征,具体参见[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② 仔细考察德国选择党的发起人和党员构成可以发现,德国选择党无疑是标准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党,而且其在德国如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等富裕州的党员人数与受欢迎程度远高于德国非经济核心地区。有关德国选择党与法国国民阵线的构成特点分析,参见余南平:《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6—154页。

^③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城大学教授迈克尔·卡赞(Michael Kazin)以《民粹主义的诱导》为题论述了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运动,并提出了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自身阶层的限制的观点。但这个判断却无法解释和说明德国选择党的出现,包括目前获得数量可观的州选举席位的新现象。参见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Marine Le Pen, “Need to Return to Economic Sovereignty: Marine Le Pen,” *Squawk Box Europe*, April 29, 2015.

^⑤ Victor Mallet, “Le Pen protégé Vows to Reclaim Sovereignty from EU,”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0, 2019.

的观点。^①当然,更坚定和极端的看法来自欧洲东部国家匈牙利的执政者欧尔班。因此,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似乎天生就是为“国家主权”而战的“民众代表”,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与鼓动不可避免地会在潜意识上影响欧洲的政治生态,许多即使不赞成反移民和反多元化的欧洲人,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民粹主义的主张却有相似的认同。

总体而言,无论是全球化理论认知演化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还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竞争强化,包括欧洲民粹主义运动潜在影响的各种因素的综合叠加,都使得欧洲范围内“强化经济主权”的认识成为政治经济行动的“选择共识”,也将在更广泛意义上影响欧洲对内和对外战略的调整。

三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的行动落实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的各种理念的交织与互动,包括政治家的言论,甚至是政策设计与制度构建以及战略规划,只有转化为具体可见的经济行动才具有战略实践价值。换言之,判断欧盟加强“经济主权”的具体行动计划、机制协调,包括资源分配,可以来自对布鲁塞尔欧盟的各类规划文本的分析,^②但更多的还需要从产业链端,如动力电池、医药与医疗物资、清洁能源、新一代计算机算力等标志性项目的落地和未来产业配套形成中才能对欧洲“经济主权”的行动落实一窥究竟。

首先,欧洲推动战略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向新能源转型是明确和坚定的。而这也遵从了欧洲“气候中和”的广泛政治认同,并落实到了欧洲强势产业端。早在2016年,欧洲电池供应商诺斯伏特的创始人瑞典的彼得·卡尔森即已表示,在电动汽车起步时,中国政府已经为企业提供服务和各种优惠政策,并形成发展电动汽车的政策导向,集中力量打造电动汽车市场,但在欧洲,这种情况却不会发生,这是欧洲需要反思和未来努力的方向。^③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则更直接地指出,欧洲需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汽车工业对于欧洲的工业基础至关重要,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电池产业。电池成本大概是电动汽车成本的40%,如果欧洲国家只能通过进口来获得汽车电池,

^① Sylvia Poggioli, "Italy's Matteo Salvini Hopes to Lead Nationalist Wave in Upcoming European Elect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22, 2019.

^② 对于欧盟强化经济主权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机制建立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具体参见忻华:《“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第1-30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欧洲而言,产业链构建的驱动力和承担者是公司,包括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价值链构建也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欧盟作为战略规划、政策设计者,其在形而上层面的努力能否成功,需要得到来自经济基础的产业链端的支撑。因此,从产业链端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也更具实践价值。

^③ Richard Milne, "Battery Maker Northvolt Scales up Ambitions with Factory Push,"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6, 2019.

那么欧洲就会失去这个行业中全球价值链的增值以及核心技术,也意味着失去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① 基于战略上的共识,2019年5月,法国与德国达成协议,共同组建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② 而在德法采取联合行动之前,欧盟层面上的欧洲电池产业联盟已于2017年正式成立,并得到西门子、戴姆勒等欧洲著名企业的支持和参与,旨在为欧洲电池产业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芬兰等七国申报的电池产业“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划”(IPCEI)也得到了欧委会的批准。欧洲各大企业本土布局计划也纷纷落地,尤其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战略自主”下的电动汽车产业链“补短板”行动明显加快(见表1)。

其次,医药和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在欧洲得到明显的重视。2020年疫情的暴发,使得欧洲范围内出现了防疫物资短缺和医疗资源被“挤兑”的现象,欧洲国家之间甚至发生了防疫物资被截留的事件。欧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不仅承受了极大的考验,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也迅速成为欧洲政治家和公共舆论关注的话题。为此,欧洲方面旋即做出快速反应,呼吁加强和保障医疗物资的欧洲范围内本土化供应链的建立,进而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见表2)。

再次,欧洲能源供应的战略安全问题也正在通过欧洲项目投资加以解决。除了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链的自主能力加强以外,对于新能源其他领域如风能、太阳能、氢燃料和储能等,欧洲也正在按自主可控和规模扩大的原则,加大力度推进项目落地(见表3)。从欧洲的“战略自主”和“战略安全”的意义上看,这些基础类新能源项目的启动,表面上是为实现欧洲的“碳中和”目标而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但其隐含的“能源战略安全”的潜在价值,则是为了彻底摆脱欧洲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供给依赖,并在战略上实现自主选择 and 突破“安全制约”瓶颈。^③

最后,在前沿科技领域,特别是属于欧洲短板的“算力”和半导体设计芯片领域,欧洲已认识到了全球新技术竞争的基础性、前沿性以及对美国技术的过分依赖。面对全球快速的“数字经济”转型,欧洲正奋发直追加大投资力度(见表4),并希望未来在全球“算力”市场拥有欧洲自主的关键技术和市场生态体系的构建能力。

^① Cabinet de Bruno Le Maire, “Feu vert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u projet européen sur les batteries, coordonné par la France,” *Communiqué de Presse de Bruno le Maire*, December 9, 2019.

^② “France, Germany Plan to Create Leading Battery Industry,” *The Associated Press*, May 2, 2019.

^③ 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一直是欧盟政治的辩论话题,就在特朗普政府针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施压无果后,欧盟内部却因管道项目引发巨大争议。欧洲议会2021年1月以压倒性优势要求德国停止“北溪-2”管道项目,给德国默克尔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具体报道参见 Andrew Rettman, “Nord Stream 2: MEPs Call for Halt to Russian Gas Pipeline,” *BBC*, January 21, 2021.

表 1 欧洲动力电池投资一览表

项目名称/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企业/组织/国家	投资金额和来源	目标
1. 欧洲最大锂离子电池厂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建设, 预计 2021 年投入生产	瑞典	诺斯伏特 (Northvolt) 大众汽车公司 宝马公司	(1) 大众汽车集团、高盛集团、宝马集团、AMF 和 Folksam 保险公司等共同完成了 10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2) 欧洲投资银行提供 3.5 亿美元贷款	① 生产更低成本、更高技术、更环保低碳的锂离子电池, 满足欧洲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电池需求; ② 建立欧洲自己的大规模电池制造供应链, 增强欧洲的生产韧性与战略自主性
2. 德国电池超级工厂	2020 年 9 月 23 日宣布, 2021 年投入生产	德国下萨克森州	诺斯伏特 大众汽车集团	(1) 大众集团投资 10 亿美元以支持与诺斯伏特集团的电池合资业务; (2) 获得欧洲投资银行 (EIB) 6480 万美元的贷款	规划最终每年产能最高可达到 24 千兆瓦时
3. 高压电池模块生产基地	2020 年 9 月 23 日宣布, 2021 年投入生产	德国莱比锡	宝马	计划到 2022 年对莱比锡动力电池生产线投资超过 1 亿欧元	电池模块化生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需求、节约成本、增加产量, 扩大其在德国的电动汽车零部件生产能力。最快到 2021 年, 宝马集团在欧洲销售的汽车中, 预计每四辆车中就有一辆是电动车型。到 2025 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一, 到 2030 年将达到二分之一

4.全球动力电池网络	2020 年上半年	世界多国	戴姆勒公司	戴姆勒旗下品牌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将其全球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投资 10 亿欧元以支持其生产电池	打造一个包括中国、德国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电池生产网络,提高电池生产能力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并为奔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的“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5.斯洛伐克超级电池工厂	2021 年正式生产	斯洛伐克	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 InoBat Auto 公司	(1)斯洛伐克政府投资 500 万欧元; (2)捷克能源供应商 CEZ 集团 1000 万欧元的担保资金; (3)该公司分阶段投入 10 亿欧元	生产出符合汽车制造商要求的电池,以减少电动汽车制造商对亚洲制造的依赖,这对提高欧盟的技术独立性至关重要
6.巴斯夫第二座欧洲电池材料工厂	2020 年 2 月 12 日宣布,预计于 2022 年正式投产	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	巴斯夫	德国联邦政府为该项目提供 1.75 亿欧元支持	预计可满足 40 万辆电动汽车的阴极材料需求,为汽车生产商提供可靠、可持续的本地电池供应,在欧洲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电池制造价值链
7. Automotive Cell Company (ACC)	2020 年 1 月宣布成立	法国新阿基坦地区,德国	标致雪铁龙集团 道达尔公司集团 Satt(法国电池制造商) 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会 (ZWEI) 欧盟委员会“欧洲共同利益重要计划”(IPCEI)	(1)法国和德国政府财政支持(13 亿欧元) (2)欧盟委员会的公共预算资金 (3)整个项目将动员超过 50 亿欧元投资	按照规划,法国境内的工厂在 2021 年中期启动,投资金额 2 亿欧元,进行先期研发投入,然后将产能逐步提升至 24GW,紧随其后是德国同等产能工厂建设。到 2030 年,这两座电池工厂的产能达到同等的 48GW,年产 100 万个车用电池,约占欧洲市场的 10-15%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报道的信息汇总整理。

表2 欧洲医药、医疗物资类投资一览表

项目名称/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企业/组织/国家	投资金额和来源	目标
1. 药厂扩张项目	2019年-2020年投资	塞尔维亚	德国制药商 Stada	2000万欧元资金	对在塞尔维亚的产业布局进行扩容
2. 医疗防护用品生产项目	2020年3月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拉施塔特市	德国防护用品制造公司 Dach Swabian 机器制造公司	暂无数据	缓解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3. 制药项目	2020年4月	法国	法国制药公司 Seqens	暂无数据	①新设工厂,增加产能; ②缓解对亚洲原材料的依赖,配合政府树立回迁标杆
4. 新冠疫苗项目	2020年6月	法国	法国生物制药公司 Sanofi (全球第三大疫苗生产商) 法国政府 欧盟	Sanofi 公司投资 10 亿欧元	①建立疫苗生产基地和疫苗研究中心,提高法国疫苗的生产 and 研发能力; ②实现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增加应对疫情风险的灵活性
5. 药厂回迁项目	2020年6月	法国	法国生物制药公司 Sanofi 法国制药公司 UPSA 法国政府	暂无数据	①减少对中国原材料和生产线的依赖,开发法国境内的对乙酰氨基酚生产线; ②配合政府促进产业回迁
6.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项目 (LIGATE 项目)	2021年1月1日启动	欧洲多国	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事业部 (EuroHPC)	590万欧元(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资金)	充分利用超级计算功能来改善计算机辅助药物的设计,用于支持各国对全球新冠流行性危机的及时反应
7. 抗生素项目	2021年1月5日	奥地利	瑞士制药公司 Novartis 旗下公司 Sandoz 奥地利政府	Sandoz 提供 1.5 亿欧元资金; 奥地利政府提供 5000 万欧元公共资金	①提高欧洲的综合抗生素生产量,提升欧洲基本药物的生产能力; ②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提高欧洲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报道的信息汇总整理。

表 3 欧洲清洁能源投资一览表

项目名称/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企业/组织/国家	投资金额 & 来源	目标
1. NEXTBASE 太阳能项目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欧洲多国	迈耶伯格研究公司，来自德国、比利时、瑞士、法国、荷兰、捷克、意大利、挪威 8 个国家的 14 个合作伙伴	总投资 445 万欧元 欧盟投资 380 万欧元	①生产更低成本、更高技术、更环保低碳的太阳能电池； ②使欧洲在太阳能电池制造领域具有竞争力，以摆脱对亚洲制造的依赖
2. 风能制氢项目 (Wind-to-Hydrogen Project)	预计 2021 年 1 月投入生产	丹麦	西门子 Gamesa 公司 丹麦 Everfuel 公司	①西门子子公司； ②欧盟“氢战略”(hydrogen strategy) 投资	①主要应用于运输业、重工业，实现欧洲电力供应脱碳和全球能源转型； ②储存氢能源，用于今后解决其他行业的问题
3. Horizoo 太阳能项目	2021 年 1 月 12 日宣布启动	法国西南地区	能源公司 Engie 能源公司 Neoen	暂无数据	①确保向工业公司直接供电，是对法国目前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的真正突破； ②将太阳能与电力存储等技术创新相结合，加快法国的能源转型
4. 风力发电厂项目	2021 年 1 月 19 日签订合同	西班牙	独立电力生产商 Greenalia 可再生能源开发商 Elecnor 西门子 Gamesa 公司	7760 万美元	为该地区家庭提供电力
5. 英国大型储能综合设施	①计划于 2022 年开始建设； ②2024 年投入使用	英国埃塞克斯物流园区	英国能源公司 InterGen；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BEIS)	2 亿英镑	①支持和稳定现有的电力供应； ②提供低碳、灵活的电力解决方案，支持欧洲能源转型
6. 绿色氢燃料项目	预计 2022 年启动并运行	智利南部	西门子 Gamesa 公司 保时捷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德国政府(德国国家氢战略) Enel 智利绿色电力公司	德国政府出资 823 万欧元 保时捷公司投资 2000 万欧元	①从国外获取绿色燃料，以解决德国国内可再生能源氢生产空间有限的问题； ②建立一条全新的供应链；可再生能源将不只在市场国生产，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也可大规模生产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报道信息汇总整理。

表 4 欧洲计算机投资一览表

项目名称/类型	时间	地点	参与企业/组织/国家	投资金额 & 来源	目标
1. 超级计算机项目	2018 年签署, 2019 年正式启动, 预计 2023 年建成	卢森堡	欧盟 工业部	欧盟投资 10 亿欧元; 欧盟 25 个成员国拨款	①开发欧洲超级计算基础架构; ②支持旨在开发欧洲超级计算生态系统的研究和创新活动; ③加强欧洲 HPC 技术供应链, 以提高欧洲在全球的技术竞争力
2. 量子计算机项目 (欧洲第一台量子计算机系统)	2019 年 9 月签署, 计划于 2021 年初投入运行	德国	IBM 德国联邦政府	德国巴登州政府投入 4000 万欧元 IBM 公司投入 10 亿欧元	①德国作为欧洲的研究基地, 将成为欧洲的量子技术中心; ②保证欧洲在拥有数据主权的情况下, 开发面向应用的量子计算策略
3. 半导体项目	2020 年 12 月 9 日签署项目, 未来 2-3 年内大力发展	欧洲多国	17 个欧盟成员国	1450 亿欧元资金	①加强成员国在半导体价值链上的合作, 包括设备和材料、设计以及先进制造和包装方面; ②半导体行业是欧洲绿色计划、数字议程的核心部分, 对提高全球技术竞争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4. 超级计算机项目 (SCALABLE 工业项目)	2021 年 1 月 1 日启动	欧洲多国	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 事业部 EuroHPC	300 万欧元(欧盟 “地平线 2020”计划 资金)	利用计算机流体动力学来提高工业性能, 为将来欧洲百亿兆级系统提供效率和扩展性
5. Hexa-X 项目 (6G 技术)	2021 年 1 月 5 日	欧洲多国	欧盟; 诺基亚、爱立信牵头 的总共 25 个行业和 学术合作伙伴	现已获得 1200 万欧元资金	①是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建立互连智能、具有可持续性和全球服务覆盖范围、可信的跨引擎结构; ②加快欧洲数字化步伐, 保护欧洲技术主权, 提高全球竞争力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报道信息汇总整理。

从上述各项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特别是欧洲领先产业如汽车行业转型项目的落地情况看,欧洲的强化和建设经济主权的“战略自主”目标并不仅仅是学者、智库们的纸上讨论,也不是欧洲政治家的口头表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特别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供应链与产业链短板包括新技术竞争加剧的问题已经得到欧洲各个层面的重新审视和重视,而本土化、欧洲区域化的投资项目部署已渐次展开。这不仅是欧洲抓住抗疫机会、扩大共同救援行动经济层面的努力,更是欧洲通过产业链重塑、实现欧洲“经济主权”和“战略自主”的共同行动。而这些行动在未来产生的影响,不仅将体现在欧洲产业链层面,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构,进而产生微妙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性影响。

四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分析

技术革命进步的原有路径与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的双重叠加影响,引发全球价值链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呈现整体规模萎缩、本土化和区域化加强、数字化转型加速、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实施价值链拆解五大典型特征。^①至于欧洲强化经济主权落实到全球价值链层面将带来怎样的变化,首先要分析欧洲的全球价值链现有特征和结构,其次归纳其约束因素,最后判断未来的影响。

(一) 欧洲占据复杂全球价值链但市场“内卷化”程度下降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以实证数据支撑的全球价值链拓扑结构变化分析表明,以疫情前2000-2017年全球供应枢纽区域中心国的变化来看,2000年全球传统贸易网络三大中心分别是美国、德国和日本,而到了2017年,北美和欧洲的网络拓扑结构几乎没有显著变化,但在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贸易增加值出口的全球第二大供应枢纽,并通过枢纽的作用链接高收入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研究还发现,就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演变来看,从2000年到2017年的长时段变化中,贸易更加集中于区域贸易伙伴之间,区域枢纽之间并未产生重要的直接联系。复杂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快于全球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且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纽。^②因此,疫情前全球价值链的长时段结构性变化的特征表明,在以产业链

^① 关于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的研究分析,参见余南平:《新冠疫情下的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具体分析参见WTO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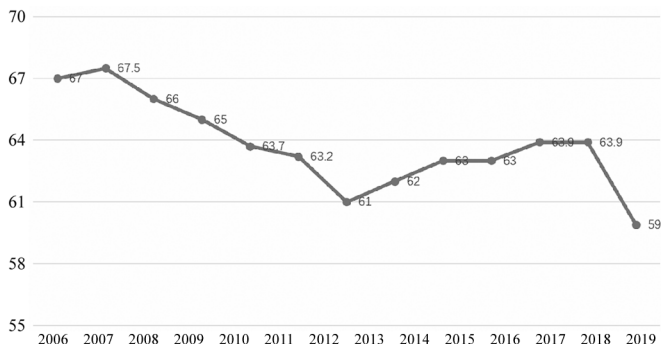
层级和关键技术控制划分的梯次全球分工模式下,全球价值链虽然出现了典型的区域和区域枢纽中心国的结构性变化,但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全球高收入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依然在全球复杂价值链中扮演中坚力量的角色,但在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欧洲的规模与能力已经明显下降。

其次,就行业部门的价值链特征而言,中国在纺织部门的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几乎覆盖全球所有经济体,并拥有增加值出口的绝对优势,而欧洲范围内像意大利、德国、法国还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中国是通过意大利、德国展开价值链活动,与法国联系较少,且欧洲范围内则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和节点进行纺织行业的贸易增加值活动;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的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跨区域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增加值活动显著大于对欧洲的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没有直接的产业价值链活动,亚洲区域内日本、韩国与中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联系活动和规模却是非常显著,而这个现象同样存在于信息与通信行业的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其差别仅在于中国对美国贸易增加值的减弱;服务部门方面,在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美国对中国的增加值活动明显,并通过荷兰链接德国,进而辐射欧洲,中国与欧洲之间没有明显的增加值活动,而在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美国与中国却同样没有明显的产业价值链活动联系,美国依然是通过荷兰,包括卢森堡与欧洲的德国、英国发生联系,且占据相当大的优势。^①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受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制造”能力对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改造,包括亚洲区域价值链活动愈加紧密等多重因素影响,以欧盟内部贸易占比的指标来衡量(见图 1),自 2007 年开始,欧盟内部贸易额占比持续下降,中间虽经反复,但下降的趋势没有出现改变。这一方面表明欧盟对于外部市场的供应链依赖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显示经过一体化的内部市场充分整合后,欧盟“内循环”能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其“内卷化”的市场扩张出现相当程度的松动。

^① 参见 WTO 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第 9-54 页。

图1 欧盟内部贸易额占比(单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年度报告(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search?p_p_id=estatsearchportlet_WAR_estatsearchportlet&p_p_lifecycle=1&p_p_state=maximized&p_p_mode=view&_estatsearchportlet_WAR_estatsearchportlet_action=search&_estatsearchportlet_WAR_estatsearchportlet_theme=empty&_estatsearchportlet_WAR_estatsearchportlet_collection=empty&p_auth=Msynekp0&text=key+figures+on+Europe)和UNCTAD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24397>)绘制。

(二) 欧洲(欧盟)的全球价值链的行业特征比较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拓扑结构仅体现了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加值联系,但如果要深入理解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结构特征,还需要对一个经济体进行必要的价值链测度和比较。比较准确的测度方法可以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的研究和改造公式,来测算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位置。^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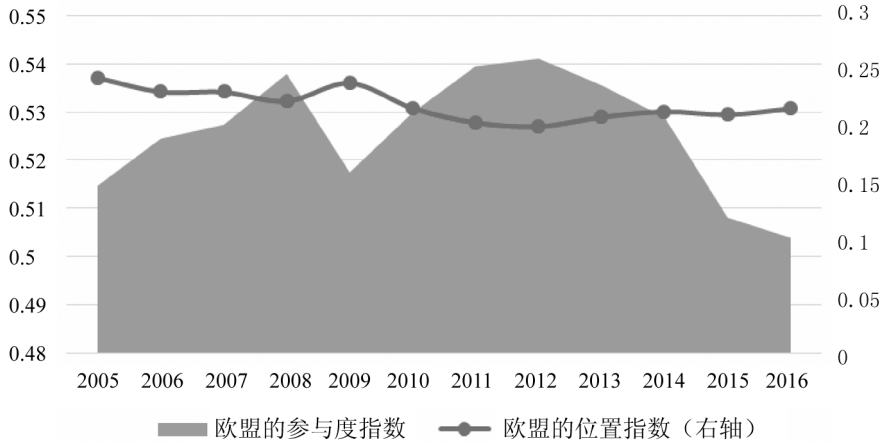
纵向观察2005-2016年11年间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和参与度的变化(见图2),可以看到欧盟这一阶段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从0.51475略微下降到0.50390,位置指数从0.2450下跌到0.2175。欧盟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存在较大波动,2008-2009年参与度持续降低,2010年后参与度回升并保持稳定,而自2012年起欧盟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逐年下降。相对而言,欧盟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虽总体比20世纪初略有下滑,但一直较为稳定。这表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欧盟的产业结构本身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强势产业基本固化。

如果将欧盟和中国、美国、东盟整体比较(见图3)可以发现,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和参与度远不如中国,稍高于美国,位置指数远高于处于末端的东盟,但参与度

^① 库普曼提炼的计算公式参见余南平、夏菁:《俄罗斯经济结构现状与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21年第1期。本文不再赘述,而是直接给出计算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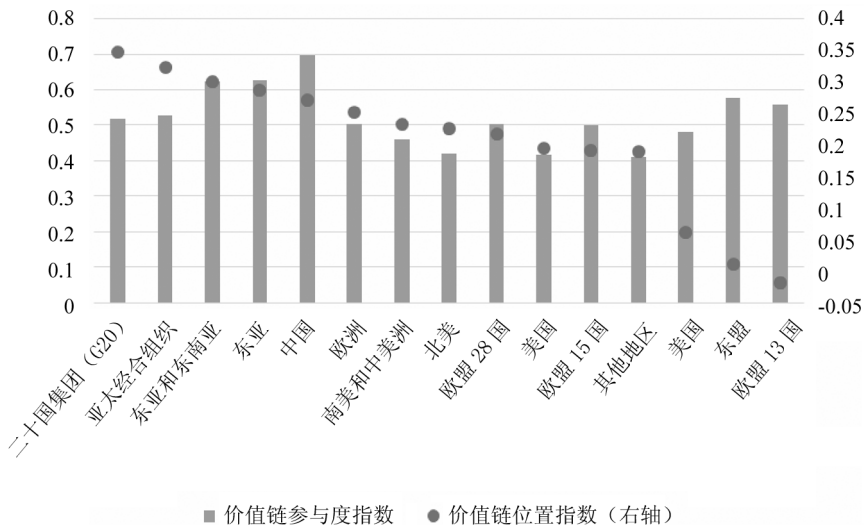
却逊于东盟。这表明,除了德国还有以中间件方式,如汽车发动机、变速箱、IGBT 功率器件等产品获得全球增加值外,后加入的欧盟的 13 国并未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更多的是作为“配属产能”并依附于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活动。

图 2 欧盟 2005-2016 年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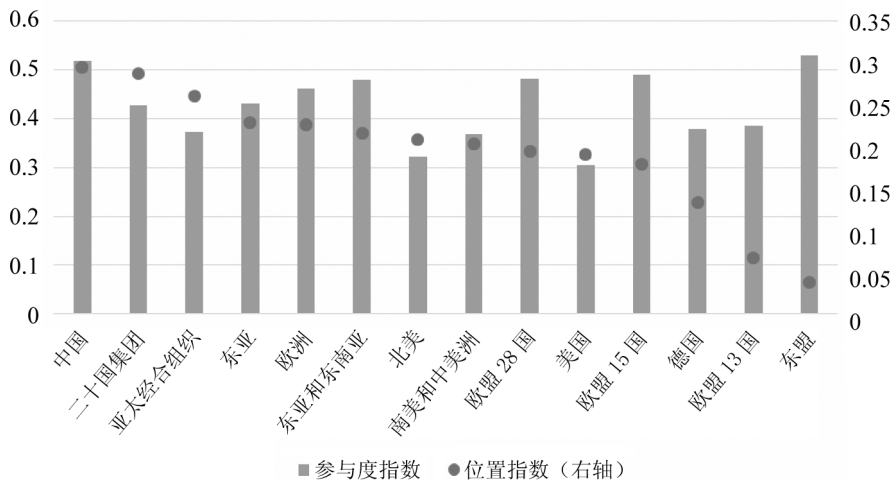
图 3 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按照具体的行业划分(见图4),在信息通信行业价值链上,欧盟的参与度很高,仅次于东盟和中国,但位置指数较低,远不及中国。其位置和美国差不多持平,这表明截止到2015年,欧盟在全球信息通信行业的价值链活动中还是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并接近最后的下游用户市场。德国博世、英飞凌、意法半导体、荷兰恩智浦等半导体芯片公司在全球信息产业中的关键能力,为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提供了基本保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15年那个时点,欧洲的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依然是全球主力通信厂商,也是终端手机通信设备提供商,在全球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这对欧洲信息和通信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上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①

图4 欧盟在信息与通信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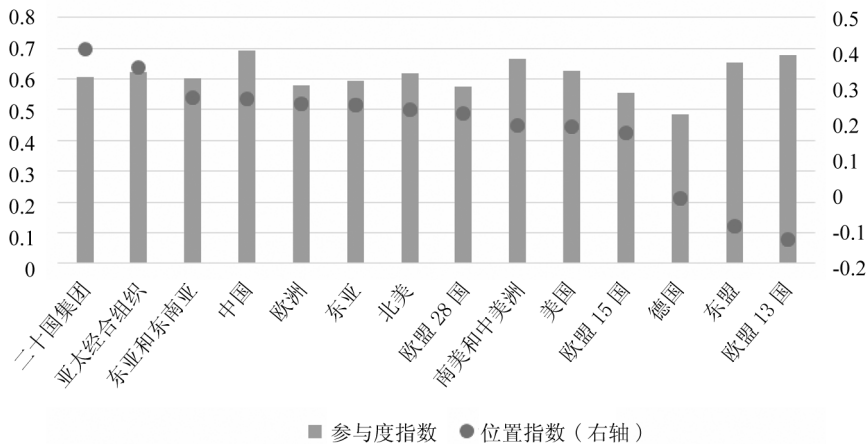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受数据库更新所限,行业数据为2015年最新数据。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优势行业运输设备价值链分析来看(见图5),欧盟的位置和参与度仅处于中游水平。它在运输设备价值链上的参与度不及中国、美国和东盟。德国在运输设备价值链上的位置指数为负数,欧盟13国的位置则更低,这表明欧盟运输

^① 虽然在2015年的时点上,欧洲爱立信、诺基亚已经在个人终端用户市场上出现明显的颓势,但根据爱立信、诺基亚和阿尔卡特三家欧洲通信公司的年报与全球其他巨头公司的数据比较分析,还是可以看到,在手机终端市场上欧洲这三大公司依然还有10%的份额,而在信息传输设备方面,其全球市场占有率还有36%。但到了2019年,欧洲通信产品市场整体业务的全球占比只有8%,而信息设备传输市场份额也下降到26%,手机终端业务几乎全军覆没。

设备对国外增加值具有相当高的依赖,同时也表明德国的全球汽车巨头更多的是采用全球价值链组合方式,形成了在欧洲境外大量部署一般零部件产能,而在本土完成设计、总装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的全球配置产能模式。

图 5 欧盟在运输设备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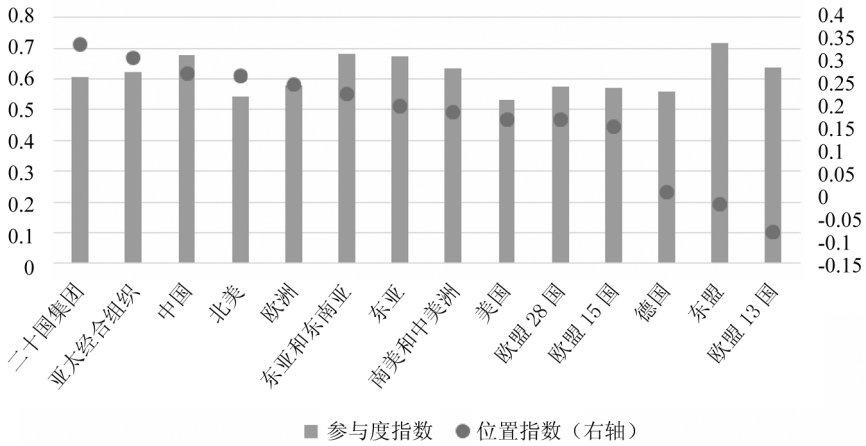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化工与制药行业作为全球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能力高低,既反映了国际竞争力,同时还对应区域和国家之间的环保水平差异。从欧盟的横向比较来看,其在化工行业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位置均低于中国,参与度比美国略高,但位置比美国略低,参与度远远低于全球领先的东盟,但位置依然比位于末端的东盟高。这表明高环保标准下的欧盟化工产业对于中国、东盟基础化工品外部产能具有某种高度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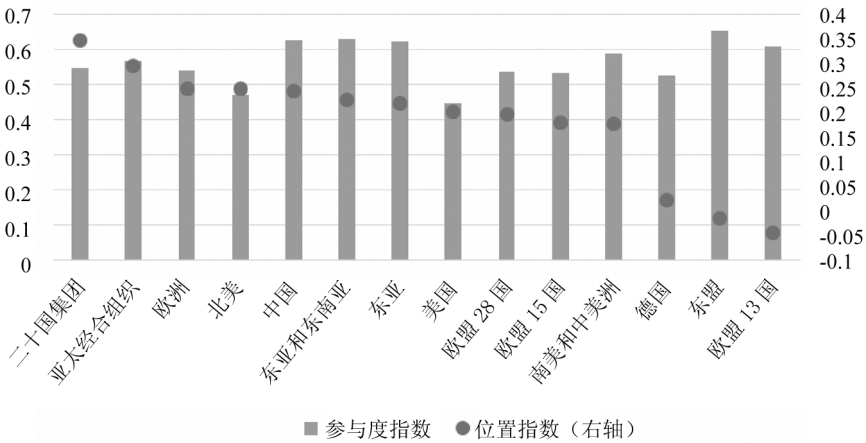
再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备受关注的制药产品价值链(见图 7),欧盟在制药产品价值链上的参与度位于全球中游,低于中国和东盟,但高于美国。同样的,欧盟在制药产品价值链上的位置也不及中国和美国,但远高于东盟。其产业链特征也与化工行业类似,虽然欧洲有瑞士诺华、罗氏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制药巨头,同时还拥有法国赛诺菲、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全球制药巨头,但其对医药原材料的依赖,主要来自中国和亚洲市场,具有与美国制药企业同样的共性。

图 6 欧盟在化工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图 7 欧盟在制药产品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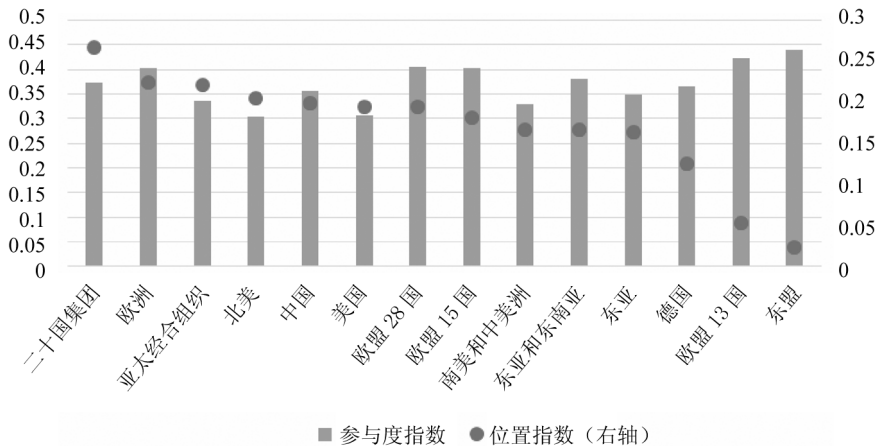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最后,来看制造业外的服务性行业。欧盟服务业发达,占 GDP 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其在服务业价值链上的参与度较为突出,高于中国和美国,但稍逊

于东盟。虽然欧盟服务业价值链的参与度较高,但位置特征也非常明显,更接近终端服务市场,而不是类似中国和美国还有部分环节依赖外部市场的服务供应并产生相应的增加值活动(见图8)。

图8 欧盟在服务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增值贸易(TiVA)主要指标计算, <https://stats.oecd.org/>。

综上,对于欧洲(欧盟)的主要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分析清楚地表明,如果欧洲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其不能脱离价值链基础能力凭空构建,“经济主权”的构建基础是主要产业链必须完成部分“本土化”和“区域化”的部署和配置,进而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而本文第三章节所列欧洲强化经济主权行动的项目落实,恰好对应了欧洲的产业链短板补齐。因此,欧洲(欧盟)的“战略自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呼吁和政策共识,而是已经在产业链层面开始了实质性行动。

(三)欧洲强化“经济主权”的全球价值链约束与未来可能的结构调整影响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加强“战略自主”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在当下的国际经济格局中,特别是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约束中并非没有瓶颈与难题。

首先,就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本身的特点而言,完成配套和短板补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段,如同过往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扩张一样,一般需要五到十年左右的周期,才能影响全球价值链结构并在数据上得到清晰的验证。同时,实现供应链的调整更需要产业链的完整性配套,而整个欧洲在历经几十年长周期的“去工业化”后,其产

业链配套体系重建和合格劳动力整合需要更多的时间。^①另外,鉴于全球价值链目前的结构特点,特别是欧洲抗击疫情不利因素的影响,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到2021年年末,欧洲规划的项目才能实质性地逐步落地和推进,而在这个供应短缺的“窗口期”,全球包括欧洲的自身需求的订单将继续向亚洲特别是中国集中,这不仅会固化和强化欧洲与已有的亚洲和中国供应链体系,同时,对于欧洲强化自身供应链体系显然具有负面影响。

其次,欧洲推动基于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的“战略自主”,将面对利润与市场收缩与本土化运营的矛盾难题。以德国三大汽车巨头的情况来看,根据奔驰、宝马和大众三大公司公布的2019年年报统计,戴姆勒奔驰乘用车和商用车总销量为334万辆,其中,中国市场总销量702088辆,占比21%;宝马公司在2019年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72.37万台,同比增长13.1%,占全球总销量的28.71%。并且中国也连续8年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而大众集团的最新财报显示,中国市场仍是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一市场,2019年,大众集团在中国市场销量为423.36万辆,占大众集团全球销量的38.6%。^②因此,德国三大汽车巨头近三成的单一市场在中国,如果不能在中国完成就地配套,或者是采用欧洲与中国双系统配套,那么三巨头损失的不仅是利润,同时还将因为供应链距离过长而可能失去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对三大汽车巨头而言,将会出现无法承受之痛。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加大了联合行动,并表示需要在前沿技术领域,如芯片和计算机算力领域进行突破,但客观地从产业内在属性和特点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发“第五代”计算机失败后,全球近几十年的计算体系、架构包括技术生态均几乎由美国掌控。虽然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研发积累中,通过巨大的各类资本投入在计算体系的自主可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距离全面塑造独立的高性能计算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而欧洲在过去几十年里,过度和严重依赖全球信息产业技术分工结构,并未在计算领域培养大批的欧洲本土化人才。其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无论是因为囿于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约束,还是受制于欧洲市场的分散,在欧洲范围内要完全实现数字化自主并实现技术生态扩张,进而达到全球价值链

^① 以欧洲力主推动的电动智能汽车行业转型而言,全球行业翘楚特斯拉在全球共有89个配套厂商,且90%在中国,德国三大汽车巨头近些年来在转型中也加大了对中国配套投资的力度,如果要离开亚洲在欧洲建设完整的配套体系,其时间与经济成本压力巨大。

^② 德国三大汽车公司的销售数据根据其2019年度财务年报分析整理,具体参见https://www.bmwgroup.com/content/dam/grpw/websites/bmwgroup_com/ir/downloads/en/2020/hauptversammlung/BMW-Group-Annual-Report-2019.pdf; https://www.volkswagenag.com/presence/investorrelation/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20/volkswagen/Y_2019_e.pdf; <https://www.daimler.com/documents/investors/reports/annual-report/daimler/daimler-ir-annual-report-2019-incl-combined-management-report-daimler-ag.pdf>。

扩张显然极为困难。^①这对于正在快速形成的未来新一代全球价值链中欧洲的产业地位显然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制约与不利因素影响,但是必须看到,欧洲强化经济主权、实现“战略自主”的行动是从产业链端和垂直行业集中展开的,具有明确的投资落实产能计划。鉴于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体量规模和市场空间,包括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特别是欧洲许多跨国公司在许多垂直细分行业中占据“价值链链主”的领头羊地位,由其推动的产业回迁和配套完成可能需要时间和资本投入,但一定会引发行业供应链结构重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成员国具有长期形成的全球竞争力基础,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中心发布的2020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显示,在全球竞争力前2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的是欧洲国家。^②因此,欧洲较强的全球竞争力也会在欧洲产业链转型中发挥可持续的作用,包括长期带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变化等。其结果不仅会增加欧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同时还会强化已经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而当全球一部分产能未来以“非经济因素”留在欧洲的时候,则会引发全球制造国家的新一轮全球市场竞争,包括贸易条件的再竞争。

五 结论

首先,可以认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百年变局”,包括跨大西洋关系在特朗普时代的恶化,特别是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欧洲的全球“战略焦虑感”陡然上升。其一方面感受到全球价值链能力向亚洲特别是向中国聚集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急速转型的时代,欧洲存在的产业链和技术短板困局。如果要将欧洲政治家提出的强化“经济主权”通过“战略自主”的行动来实现,摆脱传统上美国的控制和依赖,与中国实现“战略平衡”以达到“战略安全”的诉求,那么欧洲就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展开必要的行动。进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并带来了全球化历史上的“大合流”。^③虽然,在当下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以政治战略诉求的简单主动行动,哪怕是激进的和损失各方利益

^① 德国在2019年主导了一项针对泛欧洲市场的云计划(“Gaia-X”),旨在建立一个基于“欧洲主权”的数据基础架构,以减少欧洲对域外云厂商的依赖,但由于欧洲各国市场的分裂却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具体参见 Matthias Bauer and Fredrik Erixon,“Europe’s Quest for Technology Sovereignty: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ECIPE*, No.2,2020。

^②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20。

^③ “大合流”这一概念由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的鲍德温教授所创设,其以信息技术推动“新全球化”的视野,包括对“价值”的重新解读的分析结论更新了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概念,具体论述参见[瑞士]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李志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的单方面行动,也不能完全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底层链接基础,这一点已经被特朗普政府单方面与中国实行“经济脱钩”的战略失败所证明。同时,欧洲与全球生产体系,特别是与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之一的中国的产业链底层联系,并非单纯的政治力量所能够左右。但是欧洲主动实施的产业链体系重构与欧洲区域化部署,还是会产生一定的产业链和市场整合度的“切割效应”,而其引发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变化的力度和强度,则取决于欧洲的经济整体损失的忍受能力。

其次,欧洲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展开的“战略自主”行动,包括未来打造的产业链体系,究竟是一个开放生态还是一个“欧洲全自主”封闭体系,值得长期跟踪研判。“全产业链”国家在欧洲的消失已是历史事实,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而如果欧洲以“战略安全”考量,运用欧盟的整合能力推动和打造“欧洲全产业链”,且该体系对外进行选择性和排斥性的封闭,那么,不仅现有的基于跨区域配套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联系将会出现明显的阻断和割裂,碎片化的配套体系也可能会迎合新冠疫情下特定的思维逻辑而增加经济“安全性”考量,但会极大地损耗欧洲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效率。同时,全球产能的重复投资增加也会带来全球范围内投资效益的下降,进而影响到全球长期经济福祉的增长。而这将是摆在欧洲政治家和产业界面前的选择性难题。

最后,不能忽视的问题和变局是,鉴于欧洲在新技术革命领域丧失了先发优势并缺乏构造技术生态的能力,欧洲以“数字税”和内部市场封闭构造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技术跳跃,显然是不可为之的战略举措。而欧洲究竟是选择与跨大西洋的美国进行某种“和解”,共同联手打造“技术联盟”和“市场联盟”来抗衡中国,并参与新一轮的全球技术博弈,还是以开放的心态共同平等地推动“数字全球治理”?这个选择不单是全球技术治理和新一代数字规范标准的问题,还会撬动和影响更深层次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格局。从当今科技的发展特性来看,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已经在产业链的底层端开始了快速的数字化进程,而欧洲包括“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在产业与消费的数字化层面并不具备明显的先发和比较优势。因此,欧洲如何应对“数字经济”革命带来的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必须做出自己的明智选择。

(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责任编辑:宋晓敏)